

试论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使命与责任

□张金柱

新时代党中央十分重视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2025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向。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出发点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建设基础、四梁八柱、形式内容等，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总设计、总安排、任务书和路线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出版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门，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当然参与者和职责承担者，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必须全力以赴，担职尽责，达成使命。

文化与出版关系新解：相生相随，共融共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与出版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共同受社会存在与经济基础所支配。文化与出版是同一棵历史老藤上先后结出的两朵花朵，也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自人类告别野蛮叩问文明以来，随着语言、思维、文字的相互促进与促进，尤其是编纂、出版、传播的后续跟进与推动，文化这一棵幼苗得以快速成长积累，蔚成风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以出版为表现、拓展、翅膀，出版以文化为源泉、基础、凭借。借助出版的力量，文化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智慧、成果等得以记录、保存、转化、传播，集之成册，赋之有形。借助文化层出不穷的创造、发现、集合与创新，出版则得以有源源不断的内容供给、介质选择、传播方式等，从而在文化史、文明史、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有专家研究指出，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75%以上的有效信息是依靠文字、出版来传播、传承的。

人类文明史上那些精彩瞬间，从来既是社会、政治、文化热点，又是出版热点和传播热点。苏格拉底行吟雅典街头，柏拉图演讲《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欧几里得演示《几何原本》原理，他们既是在研究学问，寻求真理，更是在试水出版，推动传播。希腊文明中的哲学、神话、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建筑、博物等学科，无一不是通过研究写作、编纂出版、宣传培育传播传承开来的。

及至哥白尼倡导日心说，牛顿提出科学革命，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些人类重要思想文化观念的萌芽、成长乃至成形，既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更是一场出版革命和传播革命。

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则更为紧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李大钊用发表文章以探求道路，效法苏俄；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借助创办报纸杂志来批评落后，反对愚昧，宣传革命，发动民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来自商务印书馆的两个兄弟（李书城、李汉俊）的寓所召开的；党的一大后成立的三个部门即组织部、宣传部和出版部。延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了数十种政治、文化刊物。历史学家称毛泽东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三新华”（指《新华日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书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毛泽东则称自己打仗靠两支队伍：一支拿枪杆子，一支拿笔杆子。

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新使命与新期待

出版是人类冲破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是先进文化的宣传者与意识形态的把关人。出版是时代的号角，出版人与作者就是高举思想与知识火把的人。出版人的选择决定了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的高度与质量，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擘画与建构。意识形态工作更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强国建设中媒体与出版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出版人不仅负责策划、组织、选择和修改编辑内容，还必须坚定政治立场，提高理论素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出版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承者、创新者，又是新知识的发现者和新技术的实践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有效保障文化积累、更好进行文化选择与传承、更好实现文化创新诸方面，出版具有特殊意义与明显作用，出版人最早接触到新的信息、知识和智慧，以及新技术的

萌芽，他们能够最早认识和发现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推进作用的新信息、新知识、新技术的火花或幼苗，经过他们的反复打磨和悉心培育，最后形成比较规范和完善、易于为大众接受和使用的新知识、新技术，用出版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从而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出版人是社会文化工程的策划者、推进者和实施者。历史地看，中外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十分强大的推动力量。其一是文化发展呈现出十分强大而韧性的个体推进特征。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荷马、老子、孔子、司马迁等，他们都是以个人的天赋与异于常人的持久耐力完成了伟大的史诗般的创制，从而为人类文明增加了厚度与重量。其二是政府官方主持兴起的文化工程。如我国唐代以来历代的官修史书，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延至当代，更有《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国文库》等，以及持续多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出版基金等。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规模与面貌的形成起着打地基、立规范、树梁柱、确疆域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而推动这些文化工程实施落地的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出版人。

除了当好“助产士”“园丁”和“保姆”外，出版人还是优秀作者与精品力作的发现者和培养人，是诸多优秀作品的鉴定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培育者。编辑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发现和培养作者，将一般大众培养成能读书者、对写作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培养成优秀的作者。发现和培养写作新人，是编辑出版的本质意义与价值所在。

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目标已定，方向已明。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责任与任务赫然在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努力完成。

坚持党管出版。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坚持党管出版的根本原则。坚持出版的高质量与高品质。出版事业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出版业坚持党的领导，既是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的光荣传统，也是国有文化企业的独特优势。

做强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

出版行业凸显社会效益、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是出版担负文化使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抓手。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及时策划、编辑、出版、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读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完成其肩负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做优精品出版。从大量一般图书中提炼精品图书，从精品图书中打造重点图书，最终形成象级图书和标志性图书，是出版界打造品牌、扩大影响的通常做法。内容为王是新闻传播的铁律，精品图书是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发展的标志。出版界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等大力开发相关图书产品；要根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宇宙科学的新发展、新变化创新发展相关图书；要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与新需求策划相关图书。

做好重点出版。全力建设做好国家重点图书和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的能力，提升获取国家级出版大奖的能力与水平。要精心规划一批阐述党的创新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并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精品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服务于我国教育工作的精品力作；精心规划一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品力作；精心规划一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出版精品。

试水融合出版。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融合出版已成出版行业发展共识。要明确融合出版目标，建立涵盖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全流程规划与激励机制；要强化组织协同机制，通过跨部门协同打破传统壁垒，设立专项工作室，统筹重点项目；要实现技术赋能与产品形态革新，引入AI、超高清、VR/AR等技术重构内容形态，通过AI立体呈现编辑艺术，增强交互体验；要深度做好内容资源开发，做好内容升级与用户需求契合，实现内容立体化开发，将单一图文升级为声像+互动+动画融合产品，突出产品的全媒体思维，真正实现内容、媒介、渠道的融合。

（作者为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跨越千年的集体记忆，镌刻着文明发展的基因密码，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历史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洛阳市考察龙门石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一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锚定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战略领航：擘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蓝图。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是承载中华文明的珍贵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治国理政重要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重要场合，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发表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指明方向。

从敦煌石窟到三星堆遗址，从平遥古城到殷墟古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地地方考察中反复强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号召“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立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保护理念持续健全，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博物馆参观人次实现“井喷式”增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氛围日益浓厚。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传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部署建立协调机构与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实保障。

多维发力：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格局。文化遗产是历史馈赠的珍贵宝藏，镌刻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明密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通过多样化举措与创新实践，全方位推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推动文化繁荣、增强民族自信的时代命题。从制度创新到实践探索，从理念革新到技术创新，一系列系统性举措正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注入强劲动能，让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制度筑基，夯实保护传承根基。制度建设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四梁八柱”。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遗产家底不清、管理分散的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文物“数据多跑路”，不仅实现了资源的精准管理，更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这一制度创新，犹如为文化遗产装上了“智能管家”，使其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极大提升了保护的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

辩证施治，平衡保护发展关系。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文化遗产焕发活力的关键。统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绝非简单的二选一，而是要在二者间找到动态平衡点。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例，通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严格保护遗址本体的基础上，打造集考古研究、文化展示、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实践证明，唯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实现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系统保护，织密全域防护网络。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与周边环境、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通过实施“大遗址保护国家工程”，我国对长城、大运河等150处大遗址开展系统性保护，将古建筑周边生态风貌的协同保护纳入规划；在非遗传传承领域，推动“非遗工坊”与乡村振兴结合，如贵州苗绣、苏州缂丝等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打破部门与地域的壁垒，实现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治理，让文化遗产保护从“单打独斗”走向“握指成拳”，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格局。

创新赋能，激发遗产时代活力。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经济、外交价值。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数字敦煌”项目的全球共享、非遗技艺的时尚化表达……这些创新实践让文化遗产走出博物馆、书本，以鲜活姿态融入当代生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成为滋养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

文明互鉴：拓展文化遗产国际交流新境界。在全球化浪潮奔涌向前的今天，文化已成为国家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密码，更蕴含着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语言。以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引领，既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必然选择，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文化力量。

文化遗产是中国故事最生动的讲述者。从敦煌莫高窟绚丽的壁画中，世界看到了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辉煌；在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里，国际学界惊叹于五千年前中国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部部立体的史书，无需过多修饰，便能向世界诉说中国的历史脉络、哲学思想与审美追求。加强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就是要打破语言与地域的隔阂，让这些“沉默的瑰宝”成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

国际交流合作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催化剂。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深度合作，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先进的技术。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为中希文物保护技术领域多学科协同创新与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中法国际物质遗产与土遗址保护展开合作，让中法文化遗产领域合作迈上了新台阶。这些合作实践证明，在交流互鉴中，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保护传承，同时也成为增进国家间友谊、促进民心相通的纽带。

以文化遗为媒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创新传播方式与话语体系。在数字时代，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让文化遗产“破圈”传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通过精美的文物短视频、趣味历史科普，吸引了大量海外粉丝；“中国非遗文化周”在世界各地举办，现场展示剪纸、榫卯技艺等，让国际友人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此外，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阐释文化遗产背后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理念同样关键。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到“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将中国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价值提炼升华，能够有效消除文化误解，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国故事的深刻内涵。

守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更系统的保护举措、更开放的交流姿态，让中华文明瑰宝绽放时代光彩，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传承文化遗产 彰显时代担当

□徐辉冠

实事求是的文化溯源

□李佑新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作为一个成语，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汉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中国成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高度概括，堪称“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究竟从何而来、渊源何处，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唐珍名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湖湘文化探源》以深刻影响毛泽东的湖湘文化为视角，探究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脉渊源，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包括在湖湘大地的传承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改造，比较深入地揭示了湖

湘文化涵育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整体逻辑、内在机理与重要贡献，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华文化探源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

这条崭新路径是，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湖湘文化探源”为主线，沿着“历史文本考察—基本理论分析—内在演进揭示—重估价值贡献”的逻辑思路开展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深度探析湖湘文化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结构、内涵特性和生成机理；其次，通过对历史文献研究，全面梳理和总结湖湘文化涵养和塑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整体性过程，揭示湖湘文化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关联和演进逻辑；最后，科学评价湖湘文化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相对于学界以往的类似研

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湖湘文化探源》具有三个创新。一是不仅立足于文本考据的静态视角，更关注其精神实质上的内在关联，进而分析和探究驱动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生成的文化机理；二是不仅立足于历史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逻辑进路，更多地侧重于湖湘文化独有的涵育功能和特殊的演进理路；三是不仅立足于宏观意义上的概述，更注重史料挖掘，既在纵向上比较完整地交代了其“来龙去脉”，也在横向上比较全面具体地说清了其“血肉相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湖湘文化探源》紧紧围绕中华文化血脉线索，从中国传统文化治学考据的实事求是、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现实的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的实事求是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实现湖湘实事求是传统的思想升华、湖湘实事求是传统深刻影响、实事求是思想的四重维度和湖湘文化涵育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价值意蕴等方面，构建了相互呼应、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系统结构。这对于我们以厘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化渊源为范本，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当然，如果作者在毛泽东读书习惯、读史方法等方面，包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整齐严肃，与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关联上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会使本研究更加丰满。

（作者为湖南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